

July 2019

On the Genealogy of Heresy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uiying Xi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ie, Huiying. 2019. "On the Genealogy of Heresy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4): pp.204-21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4/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论革命文学的“异端”谱系

谢慧英

摘要: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革命文学”有关文学性质、功能、方向和立场的论争中,即伴随着多种话语各不相让的众声喧哗。其后所发展出的革命文学,则在每一阶段或隐或显的,都存在着与代表正统的文学主潮与权威话语相分歧的“异类”分子。随着历史的推演和时势的变迁,它们的异质性被不断“放大”,最终形构出了具有连续性的“异端”谱系。在主流文化风向不断收缩、意识形态规训日趋强化的语境中,他们陷入了深重的历史困境。从渊源上看,陈独秀与鲁迅,这两位终极目标颇为一致而在具体个性、行为和方法上各有特点的“革命者”,一显一隐,成为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源头。从深层精神结构来看,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特质蕴涵着来自现代性的追求和现代民族国家冲动之间的紧张冲突。

关键词: 革命文学; “异端”谱系; 现代性; 现代民族国家; 冲突

作者简介: 谢慧英,文学博士,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现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185号集美大学文学院,邮政编码:361021。电子邮箱:sosofool@126.com

Title: On the Genealogy of Heresy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bstract: In the late 1920s, the debates about the nature, function, direction and posi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ere accompanied by various conflicting voices. In each stage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developed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ien” elements that diverged from literary mainstream and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hese “alien” authors constantly developed and finally formed a continuous genealogy of heresy. In the context where mainstream culture became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and ideological discipline turned stricter, they were gripped in a historical dilemma. Originally, Chen Duxiu and Lu Xun were two revolutionaries with the same ultimate goal, but they ha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aspects of personalities, behaviors and ways to pursue the goal, thus being the two sources of the “heretical quality”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spiritual structure, the “heretical qualit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ontains a type of tension between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and the impulse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Keyword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 genealogy of “heresy”; modernity; modern nation-state; conflict

Author: Xie Huiyi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185 Yinjiang Road, Jimei district, Xiamen 361021, Fujian Province, China. Email: sosofool@126.com

整个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一词,与马克思学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极度强调实践性的社会学说,上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马

克思主义所到之处,几乎掀起了全球性的“红色浪潮”,对不少国家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而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后所产生的深入、持久的社会变革,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文

化建构的主要动力和根源。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条主要线索,“革命文学”自20年代起逐渐成为能够动员、聚集广泛社会文化力量的文学形态,对于民族国家建构之宏大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大半部分,革命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结着时代主题的演进,承担着国族命运的关切、政治意识形态模塑以及文化秩序和价值系统的重构等多重功能。它不只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类型,而且也是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革命进程而产生、发展,与中国社会革命在密切互动中形成的、具有复杂内涵和独特精神结构的社会-政治-精神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的内部存在着多重线索以及相互异质成分之间的重重交叠和勾连。革命文学从其萌蘖之始,就呈现出显著的冲突性,这使得它在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都保持着持续的张力。具体地说,就是革命文学内部始终存在着既与主体结构保持整一性、集中性却又不能弃除特殊性、分离性的部分。随着历史的推演和时势的变迁,它们的异质性被不断“放大”,成为革命文学谱系中的“异类分子”,乃至形构成了具有连续性的“异端”谱系。

一、革命文学与作为“异端”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革命文学”主要意指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革命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传统,大体上涵盖了自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使用较多的“普罗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依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路线所开启的“人民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在内,几乎贯穿了现当代文学史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革命文学”的内涵,大体可以指由知识分子中接受、信仰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们所创作或阐发的,旨在反映特定时期以“社会-革命”生活为核心内容,强调文学应当服务于社会革命发展的历史任务、以倾向性和真实性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革命文学”在其展开的不同时期,尽管诉诸的对象和目标有所不同,但其思想资源、文学立场和精神结构的一致性则有显著的承续: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立

独立民族国家为基本目标,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强调阶级对立和工农专政,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问题的审视和反思,对于围绕着现代文学而展开的关于启蒙与救亡、文学与政治、小我与大我、个人价值与国族认同、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乃至中国文化和价值的现代性建构等问题及其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都无法脱开对革命文学的参照和分析。

本文对“革命文学”这一概念在使用上做了一些延伸,主要是因为在今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语境中,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主流的、乃至与国家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密切关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界、文学界人士活跃于政治领域,或者在政治领域担任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身份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我们把这一部分对革命文学发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也考虑其中,既是尊重革命文学的历史实际,也更能突显出它在更开阔的历史背景中的复杂性所在,同时为我们考察本文所涉的革命文学“异端”问题提供更完整的视野。

上世纪20年代末,从革命文学发端开始有关文学性质、功能、方向和立场的论争中,即伴随着各不相让的众声喧哗(程凯 75—77)。随着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范畴的历史推进,文学的政治功能越来越被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和限定不断被强化,文艺领域最终以体制化的形态被纳入到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之中。这个过程是以《讲话》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话语权威逐渐确立为先导,由此形成了日趋严密的革命文学主流话语秩序。尽管它总体上表现为由庞杂、松散而趋于紧密、整一,但在每一阶段或隐或显的,都存在着与代表正统的主流话语相分歧的“异类”分子,他们与居于正统地位的文学主潮构成了不相和谐或者显著分歧的一个谱系。我们可以开列一份代表性的名单:如陈独秀、瞿秋白、丁玲、萧军、王实味、胡风、路翎及其他七月派成员等,至五十年代以后仍有萧也牧、王蒙等余响不绝。他们的具体身份、观念、遭际以及与革命文学正统产生分歧的背景、方式、形态、程度、结局等各有差异,但却共享了如下相互关联的五个特点:

第一,与正统观念和价值之间的“分离性”。他们都信仰或认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但由于不

同原因在意识或行为上与来自正统的严格规定性则保持某种程度的偏离和反思立场,相对于正统规范和主流话语显示出某种“异质性”;他们在高度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之时,没有放弃或保留着对现代性追求。

第二,面对正统和权威力量时在态度、心理方面的“抗争性”。他们都遭到了来自正统和权威话语的打压、批判或否定,但都程度不同、方式各异地表现出了对于个人立场的坚持,自觉不自觉地以各自的方式对威权的压抑进行了某种限度的反思、抵制或抗争。

第三,与时代主潮论调的“悖时性”。在文学的政治框范日益固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从内容到形式、从主体的思想认识到个人习性的严格规范,并进一步被确立为主流的准则。这些“异类”分子则由于文学立场、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方面存在的歧异而显得颇不合时宜。因之,其人生际遇、创作实践历程和精神困境,比主流的革命知识分子要更加曲折和艰难。

第四,在反思现实问题、揭示或反省主流弊阕方面的“超前性”。“异端”分子往往具有较强的怀疑精神或敏锐的思考能力,对常态的现实和流俗观念往往保持着警觉和反思,能较早发现存在的问题或不合理之处,并敢于大胆放言,据理力争,但这种“超前性”也恰恰是造成其“异端”困境的主要原因。

第五,精神气质和人格特质方面的“不合群性”。“异端”分子普遍具有富于激情、言行较率直、个性较分明的性格特点,或者表现出典型的“二元分裂人格”特质,承受着内心的极度痛苦;他们敢于发表异见,不完全盲从于权威和集体,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个人思考空间,或者最终以独异的方式选择了自我告白。这与传统“中庸之道”所预设的理想人格——即所谓的圆融持重、沉稳通达的行事方式相迥异。

新时期以来,在“告别革命”的呼声和意识形态的转型中,这些与革命文学的正统和权威相对而言的“异类分子”们逐渐进入学术视野,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立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对这一包容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诸多线索交缠的谱系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观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异类分子的文学主张、精神遭际以及价值选择,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在特

定时代语境中对文学属性和功能的探索和反思,充分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复杂性,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尤有特殊意义。

二、“异端”谱系中外源脉溯略

“异端”一词,在中西方语境中有各自的文化内涵。汉语“异端”一词,最早出自《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施仲贞 31—37)。孔子并非心胸狭窄、不容异己之人,主张“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大学中庸集注》128),并强调“和而不同”、倡扬“忠恕之道”,“这可以表现儒家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李泽厚 65)。两汉以降儒家独尊,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儒家思想确认和强化王权合法性的功能不断加强,形成了正统儒学,与此相悖和有所偏差的儒学派别和百家之学被目为小道他技遭到轻视,而那些质疑正统观念、臧否既存制度的言论、行为和异见者,因对政统的合法性、权威性、稳定性有所影响或存在潜在威胁,则成为被防范、压制和取缔的“异端”。如东汉时期就有反对儒家独尊,主张博通百家之言、明确表达无神论思想的王充。魏晋南北朝之际,则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雅好老庄、放浪形骸、鄙弃世俗,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指斥“六经为荒秽,仁义为腐臭”(嵇康 263)。隋唐时期虽儒佛合流,但佛学对世俗人生的否定及种种戒律则有损于正统儒学价值所依赖的社会根基,因而某些时段也曾被目为“异端邪说”。宋明理学把儒学正统观念推到极端,但物极必反,至阳明心学则已显出对于程朱理学正宗的反拨和校正,晚明时有泰州学派继其余绪,如何心隐提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寡欲” 40),主张物质欲望乃人性本然,有其合理性。同时期的李贽则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宣称“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叛逆者,自称“异端之尤”,明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千古定律,提出“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非耳”(李贽 7),高张“童心说”,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对假道学给予了致命的批判。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始酿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酵母,对近现代思想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宗羲猛烈鞭挞封建君主制度,直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 2—3),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梁启超多次褒赞顾炎武是“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梁启超 375)。这些历史上的“异端”分子,往往具有清醒的理性和独立的人格,能识别出正统观念、价值和规范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与之相悖的论说予以驳斥和修正,他们往往对权威采取鲜明的不合作和对抗态度,显示出对正统和主流的“悖离性”。

这些被正统儒学排斥、敌视的文化“异端”,在精神上与高标个性解放、民主制度的西方现代启蒙思想遥相呼应。它们经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浸润,成为清末至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儒学正统和礼教制度的本土精神资源。周作人最早明确提出了明末文学与五四文学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周作人 28)，“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30)鲁迅对阮籍、嵇康表示了极大的激赏,对深受李贽影响的袁宏道大表赞誉:“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招贴即扯”;《且介亭杂文二集》228)有学者认为,鲁迅杂文“既受到卢奇安的影响,又受到李贽的影响,这两人的文章都是通过反讽和嬉笑怒骂的话语方式在其文字中表现一种独特的思想魅力”(郑家建 162)。“鲁迅的灵明说和精英主义倾向与李贽的‘童心说’、龚自珍对于‘心力’‘奇人’的呼唤,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耿传明 88)当然,晚明以来这些“异端”思想本质上还是属于传统的反叛,“所凭借的文化底蕴主要还是传统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张福贵 刘中树 170),而五四文学则是“在一种外来的现代文化价值尺度的参照下,对以儒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整体批判”(171),二者存在根本性的时代差异。

除了渊源久远的本土传统,尊崇个性价值、崇扬主观精神和独立人格力量的西方启蒙思想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资源。特别是西方思想史上也曾带有显著“异端”特质的卢梭和尼采,成为包括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众多五四文化先驱宣扬新观念的旗帜。卢梭作为启蒙先驱,最终四面

受敌的原因在于他敏锐地察觉了内在于启蒙“神话”的工具理性的危险和潜在的伦理道德的深刻困境,并且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尼采作为“异端”的骇人之处在于宣告“上帝已死”,声扬重估一切价值,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观给予了沉重的痛击。清未经梁启超等推介,卢梭、尼采等也成为陈独秀和鲁迅等新思想的主要资源。陈独秀认同卢梭把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41),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为榜样发起了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学术,借以唤醒国人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尼采关于“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的概念被他借用于《敬告青年》来表达对个人自主精神的伸张。青年鲁迅明确宣称“别求新声于异邦”,“特别欣赏、赞颂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异端分子,他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发生共鸣”(吕周聚 43)。鲁迅崇扬的“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共同特征在于“大都不惟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深感后世人心”(“摩罗诗力说”;《坟》65—66)。在其《摩罗诗力说》中文首小引即用了尼采的文句,在《文化偏至论》中视为尼采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最看重尼采所体现出的“主观之内面精神”,将此作为“立人”的要义所在,并以此为楷模热切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坟》48—55)。鲁迅以笔为矛,以文为枪,塑造了诸如“狂人”“疯子”“这样的战士”“夏瑜”“过客”等“异端”式的先觉者形象,而他自己不畏强权,不惧流俗,犀利深刻地批判着正统势力的虚伪荒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精神界战士”的使命。渗透于鲁迅作品及其独立人格中的这一精神传统对革命文学“异端”谱系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回响。而陈独秀则与尼采在文化观上颇有相同之处,他们都“以批判传统文化的陈旧价值而企图开创一个崭新的思想局面。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们都集中焦点于伦理的改造”(陈鼓应 153)。陈独秀对于社会改造的高昂热情和理想主义式的“乌托邦”冲动,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和果决的实践品格,亦是革命文学“异端”后进们的精神源泉之一。

此外,两部西方文学经典中的两个文化幽灵堂吉珂德和哈姆雷特,五四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

广为接受,并对他们的内在思想、精神气质和人格特质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钱理群先生曾对这两个形象“东移”现象做过细致的精神史耙梳,揭示了他们从原产国向英国、法国、俄国至中国的“旅行”过程中,其精神内涵和形态不断被深化、丰富而又错综交互的关系,并指出这两个人物还孕化出了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对1920—19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亦产生了普遍的影响。^①这自然也包括了革命文学的这些“异端”分子在内。

从西方语源学的角度看,异端(heresy)一词来自基督教。使徒时代的后期,一些基督教领袖认为:为了保持基督教会连贯性,一些“意见分歧”或“异见”者必须被拒于门外。这使得主教成为可以分辨对与错的权威,亦可以阐释《圣经》的教义。另一些对《圣经》或神学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则成为“异端”,获得主教接纳的教义便是所谓“正统”的及“普世接受”的。“不同意见”被认为是“heterodox”即非正统、异于传统教理的另类意见。当这些另类意见被主教谴责时,通常便会判定为“异端”。^②简言之,异端主要意指与正统基督教义理相背离或者不为正统教派所许可的非正统教派。基督教发展历程中,大主教和宗教裁判所对于各种“异端”的残酷惩罚构成了另一部漫长而沉重的历史。茨威格曾写了一部《异端的权利》,叙述了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之间的历史较量,以文学的笔触揭示了“异端”与“正统”之间令人震惊的置换逻辑,彰显了作为极弱者的“异端”以鲜血为代价对于良知和个体权利的捍卫。塞维特斯的殉道精神和卡斯特利奥“蚍蜉撼大树”的人格意志闪耀着庄严人性的熠熠华彩。^③

上述现代化了本土“异端”资源和来自外域的文化、思想和宗教领域的“异端”资源构成了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底蕴。支克坚先生认为,革命文学所依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中大致存在两个“流派”,“两个流派的‘开拓者’或者说‘祖师爷’,前一个是鲁迅,后一个是毛泽东”(支克坚 37)。以毛泽东、周扬为代表的正统一派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文艺,“‘把文艺的政治性质和个人性质对立起来’,在强调前者的同时否定了后者”(48)。除了遵循列宁提出的“党的文学”的原则,它还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社会学”,在“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认识之前,它先已成为政治对于文艺的权力的根据:

既然文学是社会的、历史的现象,应该自觉地肩负起对社会和历史的使命,自觉地把命运跟那正在自觉地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阶级和政党联系在一起,那它理所当然地应该从属于政治、服务与政治,从属于党,服务于党”(支克坚 40)。而鲁迅则是中国“第一个直接地而且比较系统地”从经典作家的原著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支克坚 39),他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艺术也是社会现象,即追求艺术性和社会学的统一。这一派的形成,“是40年代初《讲话》发表后,周扬等人决心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冯雪峰、胡风等人则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支克坚 39)。冯雪峰、胡风的思想资源,是从鲁迅来的。从更宽泛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范围看,受到这一流派影响、并呈现出“异端”色彩的文艺家显然更具广延性。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这通常体现为法律、法规的明确限定或者道德伦理规范的潜在制约,但文学艺术毕竟属于个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在不违背意识形态规范的前提下,创作者通常都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创作首先应该是基于艺术家个人的体验、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的传达活动。在这之中,必然有配合或自觉追随意识形态方向的文艺类型,有更具普遍性的、被大众所接受的主流文艺形态,自然也存在对意识形态倾向、主流话语的偏离、疏离或者分歧性的非主流、非正统的边缘形态。因此,创作自由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常态的情形中主流意识形态大多保有对某些分歧、偏离性因素的接纳和容忍,甚至将不同立场视作必要的警醒与反思。但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当文化和思想的威权主义逐渐强化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走向极端的时期,政治就会不断入侵文学的领地,乃至压倒性地走向“唯政治论”,即与政治意识形态正统话语相分歧的、不兼容的、或者表达疑虑、批评的声音,在一统化的文学秩序中不被许可,乃至被视为“异端”,甚至可能通过制度化手段予以修正和压制。

革命文学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代表正统的主流话语权威,它被授予了对意识形态唯一合法性的解释权,代表了一统化的政治秩序在文艺领域的全面贯彻。相应地,那些与正统权威话语有所偏

离、错位的艺术家及其创作,则被视为“异己”的存在,遭到批评、限制乃至严厉的政治批判。需要说明的是,“异端”与正统之间构成冲突的背景、境况、程度和最后结局各有不同,其作为“异端”的表现形态也有所差异,但却具有深层的精神联系。因此我们选择最为突出的几个代表如陈独秀、瞿秋白、丁玲、王实味、萧军、胡风、路翎等做一梳理和阐述,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但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异端”谱系,他们在精神特质上存在某种一致性,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中,与正统的革命文学传统有所区分和不同程度的偏离。

三、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生成与流变

中国现代性从发端之始就伴随着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性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的源头是西方的启蒙思想;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是民族主义,是对一种政治实体的建构。五四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作为“老师”的身份得到大力张扬,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敌人”的另一重身份的“离场”,它事实上是隐含在解救民族危机的强烈诉求中,随时可能取代前者。这种紧张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悖论”。“革命文学”的基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认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早进入中国也就是中国革命文学开始孕育滋生的起始。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将资本主义视为造成现实社会罪恶的根源,并坚定地给出了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理想大同世界的美好允诺。苏俄革命的胜利恰逢其时,为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示范。对于经历了五四运动引发的强烈民族危机感的知识群体来说,这无疑契合了他们最为焦灼的心灵危机和热切呼告,使其看到了解决现实的民族危机并通向世界“大同”的美妙蓝图以及实施方案。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之后的迅速“左转”,也寓示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发生的剧烈波动。启蒙与救亡、自由与革命——潜含于陈独秀思想和观念中的这两级,恰恰表征了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性张力: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对理解革命文学的“异端”谱系来说,陈独秀是不可绕过的精神起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进程中,陈独秀在价值和文化立场、政治立场上均表现出剧烈的变动性:他是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开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又是引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壮大的关键性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迥异于书斋型知识分子的行动主义者,但却被他亲手创建的党组织所驱逐。晚年的孤寂生活中他非但没有保持沉默,反而选择了独立立场,毫无顾忌地表达尖锐意见,对苏联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作为“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的人生选择、个性气质和思想立场的多变,均表现出作为“异端”的鲜明个性。他的多重身份、复杂经历、精神状貌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状貌。与梁启超一样,陈独秀的真正兴趣并不在文学上,而是在政治体制以及国家模式的变革上。但建设新国家不能不“新民”,不能不建设新道德,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在于可以在思想观念上为政治和新道德的建设开辟道路。文学革命就是废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造就新国家的利器。文学观念的改弦更张与政治革新的脱胎换骨是相一贯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纲领和指导思想。当陈独秀痛批“文以载道”的旧文学(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无疑就要伸张与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相匹配的新文学(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今天我们看来属于陈独秀特有的矛盾之处:“把文学视为启蒙、革命和救亡工具的同时,又极力主张文学的独立与自由”(尹康庄 132)。但事实上,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如史学家所言,在他正式左转前后的思想结构中其实是并存互补的:“陈独秀确实未必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可能也不那么懂得自由主义,但对两者的一些基本准则都有所把握。不论他对两种主义各自认识到何种程度,陈独秀那时并不看重两者的对立,毋宁说他更注重两者互补的一面。”(罗志田 123)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短暂的历史境况中,就陈独秀的文学观而言,文学的工具性和独立性本来就可以是相互依从的,但随着民族性主题的凸显,其内在的扞格之处却必然日益激化。革命文学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其中“异端”谱系的分裂特质,与陈独秀个人所联结的中国现代性结构的

自我对抗性特质、与其文学观的这种相依相悖特质直接相关。有论者提出：“作为一个20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文艺思想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思想既有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又包孕着某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质素，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思路，都可以在他这里找到‘原型’。”（刘勇 30）因此寻溯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渊脉和发展逻辑的起点，倘不推至陈独秀这里确乎难以阐明。

如果说陈独秀是“异端”谱系的显在起点，那么我们更不能忽视作为其隐在的精神渊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鲁迅。无疑，陈、鲁二人皆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思潮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极具个性的两位思想家。鲁迅尊陈为“主将”，称他是“革命的前驱者”，并声言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南腔北调集》456）。鲁迅早期一度因悲观情绪沉入古典，后来振奋起来转向现代则得益于梁启超和陈独秀的影响，他曾表示陈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512）。新文化运动中陈、鲁二人最初的思想历程和文学主张步调基本一致，而鲁迅的启蒙观念的发生和后来的“左转”则显得要比陈独秀“慢半拍”。“陈独秀自踏入文坛以来就不是一位艺术至上者，他从事改造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改造社会服务。”（乔国强 姜玉琴 226）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鲁迅。“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511）陈、鲁二人的立场充分说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粹的文艺运动和单纯的个人解放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目的，它以文艺为手段来实现‘救国’‘新民’的历史任务”（张福贵 刘中树 177）。对鲁迅来说，“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至矣”，“尊个性”是自由境界的起点，而“群之大觉”则是终点，“立人”最终是为了“立国”。鲁迅所以弃医从文、做起小说的动因就是他认为文艺“善于改变精神”，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512）。可以说，这种对民族命运和社会、时代、民众等现实问题的热忱和关怀，使鲁迅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邃厚重，产生了巨大且久远的影响力，被毛泽东誉为“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泽东

658）。这固然是对鲁迅卓越文学成就和伟大社会贡献的高度评价，但主要还是偏向于政治方面的定位。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依然保持着独立身份和个人思想空间，并不盲从于某种信仰和权威，其天生的冷峻和批判意识并未减弱。正是这种自觉的质疑精神和深刻的洞察力，使鲁迅始终对现实保持超常的敏锐，表现出难得的清醒。因此他与那些激切、躁进却不免教条化的革命派之间的分歧和摩擦也在所难免。

概言之，陈独秀与鲁迅，这两位终极目标颇为一致而在具体个性、行为和方法上各有特点的“革命者”，一显一隐，成为革命文学“异端”谱系的精神源头。他们二人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质，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了“异端”群体的精神面貌和核心质素。一是对于正统儒家文化和现实黑暗的彻底批判性。二人均以明确的现代意识对正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那些激烈反抗正统压抑和禁锢的“异端”则大加褒扬，并赋予其以深刻的现代内涵。这种批判意识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优良精神传统，对于“异端”谱系的生成、发展影响深远，亦可谓其深层精神质素所在。二是对于独立思想、主观精神的器重和崇扬。陈、鲁二人上承梁启超“新民说”，展开并深拓了“国民性改造”的现代课题，三四十年代此一精神传统的余绪亦隐然流淌于“异端”谱系的精神血脉。陈独秀提倡的“新青年”的第一条标准即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以尼采的概念申述他的主张：“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敬告青年”；《独秀文存》5），意在唤醒国民的自主意识，摆脱奴性束缚。青年鲁迅所冀望的“精神界战士”具有“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俗，以随顺旧俗”（“摩罗诗力说”；《坟》98—99）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三是实践品格和斗争精神：二人都反对老庄的避世退隐的思想。陈独秀认为“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抵抗力”；《独秀文存》24）。鲁迅标举的“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以西方八位“摩罗诗人”为楷模，热切冀望于中国“精神界战士”的出现。而理想的诗人最基本的特质在于“攫人心”。鲁迅的至友许寿裳则认为：“鲁迅做事，不论大小，总带一点不加

瞻顾勇往直前的意味。”(《回忆鲁迅》114)“鲁迅和陈独秀的身上,都秉承了孔子所培育所代表的一类中国知识分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优秀文化精神。”(王福湘 45)四是对以本真人格为核心的新国民性的倡扬。陈独秀曾回复读者来信中时说:“‘不诚实’三字,为吾国道德文学之共同病根。”(“答张户兰”;《独秀文存》711)“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65)鲁迅则对国人的“瞒”和“骗”习性深恶痛绝,他与许寿裳在谈论国民性时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许寿裳 112),“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他疾呼人们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去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看”;《坟》254—55)。

沿着陈独秀这个重要“起点”与鲁迅这一精神源头,后继而起的瞿秋白与陈独秀有相似的身份,曾担任过中共组织的领导人,也是较早经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入中国的革命文艺理论家,同样是在领导中共组织建设过程中因为路线问题而遭到放逐和批判。1931年10月(左联成立后)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明确把五四文学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提出“我们要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瞿秋白文集(二)870)。这个论断对革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巨,可谓是后来以阶级论为核心的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先声,瞿秋白也从此确定了作为马列文艺理论家和政党领导者的身份。然而,在其生命终结之际,瞿却用极具个人性的告白方式剖露了自己真实的心迹。在《多余的话》中,他深刻地反思、忏悔自己作为中共干部和领导人在革命中的种种软弱、逃避、错误,将他刻意隐藏的另一个自我“示众”;比之于之前他所阐发的以阶级论为核心的理论话语的严肃、理性和坚硬,他的临终独白通篇是以丰富细腻的感受描述自己内心的真实状貌和人生体验,这是瞿秋白卸下层层盔甲之后在全然放松状态下灵魂的自我袒露,是在生命行将终结之际对于自我和他者的最后交心。瞿秋白这样总结自己政治失败和人生失败的“教训”：“要磨练自己,要

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多余的话”721)在他那篇自白式的临终遗言中,浓重的情绪包裹的是两个互相呼应、却又互相冲突、相互拆解的声音,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双声语”:一是从作为革命者、共产党员和中共领袖身份而作的自我批判、否定、自我忏悔,另一个是从本真自我欲求出发而生的困惑、怀疑、苦闷、悔恨、自讽和极端的虚无感、荒诞感。他无情地否定和嘲讽了自己政治人生的虚假性,将生命价值的根源还原到了对于文艺本身和世俗人生的纯粹性上。作为鲁迅“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知己,瞿秋白以绝大勇气和诚挚拒绝“瞒”和“骗”,拒绝做伪英雄,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最有力地契合和践行了鲁迅所推崇的“诚”与“爱”的精神。这篇告白以极其感性的方式将政治与文学、个性欲求与集体意志、革命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乐观主义允诺与个体价值感的匮乏之间的裂缝呈现出来,也为我们留下了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完全迥异的“另一面”形象,提供了反思革命文学诸多问题的别样视角。瞿秋白的精神历程,充分呈现了一个致力于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在个体生命吁求与革命意志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其悲剧性结局寓示了革命文学发展逻辑中潜在的危险和挑战,也预示了“异端”分子的悲剧命运。

“异端”谱系的构成中,思想改造完成之前的丁玲自然是一个最不能被人忽略的典例。正如领袖的经典题词“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所揭示的那样,丁玲的人生历程与革命文学的发展相伴随、相嵌合,其文学创作内在逻辑的变迁和冲突性更加具有戏剧性。从充满小资情调的“莎菲女士”到人民文艺家的身份蜕变历程,作为作家的丁玲在身份、性别和文学立场的嬗变与时代语境的变化、文学与政治场域的博弈、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等问题方面为我们考察革命文学内在逻辑发展变化和根本困境提供了极多的启示。丁玲最值得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左转”之后的她并不是顺理成章地定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在不断深入大众、和群众结合的过程中,早期“莎菲”式的锐利个性总是按捺不住地浮现出来,难解难分地缠绕着她迈向大众的步伐。丁玲在延安

期间,曾一度减少了创作的数量,对当时延安生活的许多复杂现象和矛盾问题进行了反思,发表的小说《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就不只是简单的歌颂,而充满着对于问题的“暴露”和自主思考。丁玲曾在一次关于文艺的讨论会上发言说:“今天谁也明白,谁也说要掌握革命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一些腐朽的士大夫的高尚情绪和小市民的趋炎附势却在妨碍这一武器的获得。”(“大度”49)她呼吁:“《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49)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任文艺副刊主编,借助于报刊阵地在解放区文坛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杂文热”,最终引发了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系列震荡。丁玲不仅自己写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文章,还陆续发表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一批旨在对“阴暗面”进行暴露和批评的杂文。这个杂文的小小波澜可以看作是延安的部分知识群体在延安文化制度建设和思想意识风向方面的一种自觉担当,他们以鲁迅为旗帜,试图将鲁迅所代表的启蒙精神传统在延安文化建设和继承、发扬,这体现了革命作家们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关怀意识,也是他们依据个性、自由、民主等启蒙主义价值标准对延安当时存在问题的集体发声,其内在精神依然渊源于鲁迅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它也可以看作是在解放区思想文化规范尚未确定之前启蒙立场的一次余波。这显然与一年后确立起的“工农兵方向”的新规范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和必然的冲突。革命文学“异端”问题的复杂性,在丁玲和她的创作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言说空间。

在革命作家中,东北作家萧军出身于行伍,天生具有躁烈、激进的莽汉气质和桀骜不羁、率性而为的书生意气,其行事行文的放言无忌使他遭受了“不虚怀努力,反是妄自尊大,狂妄已极”的指责(“文坛春秋录”;《萧军全集》第11卷413—14)。叛逆、孤傲和不肯收敛的锋芒的确是其天然秉性,他认为“一个人对于一事物,那是应该表示自己的意见或批评的。这样才算表示一个

‘人’底存在”(“谈:意见,批评,加‘公正’”;396)。年轻的萧军在落魄潦倒之际受到鲁迅大力扶掖而成名,此后视鲁迅为精神“教父”,终身以“愚蠢的宗教徒般的虔诚”(“周年祭”;《萧军全集》第11卷207),奉鲁迅为“最伟大的人”,以传扬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精神为要务,这个立场终生没有改变。他的直率和叛逆与鲁迅精神中的某些方面本来就有契合之处,而与鲁迅晚年的密切精神联系更使其深受影响,“萧军倔强的性格中有了极强的独立意识,时时处处维护着个人的独立和尊严;而在延安,高扬的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早已在被扫荡之列”(李新宇9)。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延安纪念大会上,他发出了自己的“宣言”:“鲁迅是憎恶‘腐化堕落’的;我们要坚决肃清一切‘官僚主义的倾向’‘贪污腐化的现象’。鲁迅是憎恶‘狡狴庸俗’的,我们要坚决和自己和别人的‘投机取巧’,‘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市侩主义’斗争——消灭他。[……]鲁迅是恨痛奴隶和奴才的劣根性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政策,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无原则的‘读经尊孔’。”(“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萧军全集》第11卷420—21)这种个性以及作为“鲁迅大弟子”的身份,使其到达延安后,在与毛泽东的私人交往中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但同时他也发现了延安许多不合理现象、无法容忍的人与事,并肆无忌惮地在行文言动中讥讽批驳。他在日记中坦言:“延安这地方,只喜欢听取‘首长’的意见,而且自己懒于思想习惯的人很多。”(“第八次文艺月会座谈拾零”;453)“革命的过程中在——队伍内,队伍外,自己的心思——那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撒旦’正存在着很多(而且是现代化了的)你稍一马虎,他们就要以细菌和‘闪击战’的方式向你反攻过来。”(“论同志的‘爱’与‘耐’”;535)当文化环境越来越趋向于思想的统一,集群的一体化认知被视作天然正当性的标准,萧军在个性和言行方面的特出性就成为醒目的存在,被赋予了鲜明的“异类”色彩。他写道:“我不愿像三国时代的那‘士’似的在一个据主的下面生活着,像一个属员。我是个作家,我不独推进社会,而且要监督社会”(《延安日记》60)不过,最终使其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放逐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大胆放言以及王实味事件的牵连。会中,萧军第一个发言,他

以鲁迅为例大讲艺术家的“自由”和“独立”，没有意识到与会议预设主题的严重牴牾。在众口一词对王实味的严厉批判中，萧军因“仗义执言”的挺身而出，被目为王实味的同道，以致造成了惨重的后果。萧军以“鲁迅大弟子”的身份而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但萧军的倔强性格以及从鲁迅那里继承的文学立场和社会理想，使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崇尚集体主义和行动、思想越来越被规范化的语境中越来越具有异类分子的特质。

与萧军略为相类，作为“异端”的王实味在个性上也极其鲜明，他孤僻、阴郁而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迂执，在与人相处中总是出言无忌，利齿伤人。王实味曾向鲁迅寄送过自己的小说稿和信，鲁迅曾寄还给他，但二人并未见过面（鲁迅，“日记十七”729）。使王实味遭遇生杀大祸的杂文“从体式到思想，都与鲁迅的经验资源，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没有鲁迅杂文的种子，就没有王实味杂文的花果”（李建军49）。王实味到达延安后，因突出的外语才华由张闻天点名进入中央研究院编译室就职。与丁玲、萧军相似的是，从初到延安的理想化的激情状态回归日常生活的习常，他也同样发现了解放区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良倾向，诸如等级主义、下层青年的诸多“牢骚”和其他阴暗现象等使他郁结于心不吐不快。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后来被结集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用尖锐激烈的语言对某些不合理现象做了直接的批评。他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即使是革命战士的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135）。艺术家的责任则是“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135—56）。在中央研究院整风过程中，他还提议要“绝对民主”，并表示整风对象更应针对所谓“大人物”，要以“硬骨头”的精神反躬自问：“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零感两则”；王实味139—40）这些言论及其所引发的影响使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成为反王实

味的斗争会。他最终被判为“托派分子”，开除党籍，成为整风运动的牺牲品，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学理上看，王实味的悲剧并不只是偶发性的因言涉祸，他提出的“灵魂改造”显然是将鲁迅启蒙主义的“国民性改造”内涵化合进了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硬骨头”精神则与鲁迅所标举的“精神界战士”的傲然不屈、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格紧密联系。三十年代末在国统区和延安文艺界广泛参与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他于1941年5月曾发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表示那些“认为五四以来进步新文艺为非民族的——一切这类的意见，都应该受到批判”（王实味109），明确提出“新文艺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民族的”；“‘旧形式’不是民众自己底东西，[……]它们一般是落后的”（123）。此文写成之后他读到了胡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长文，“发现拙文有不少地方意外地与他巧合”（107）。这种观点上的“巧合”恰恰表明四十年代文艺范式面临“转折”的关口，他在立场和价值取向不期而然地与萧军、胡风站在了一个队列，从而“意外”地却又势所必至地被推到了所谓“异端”的阵营之中。

在“异端”谱系的寻溯中，胡风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存在。这首先是由于胡风作为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同时又是最坚定并最具自觉意识的鲁迅文学传统的捍卫者。在民族性与现代性冲突高度激化的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现实环境使现代性诉求遭到抑制、革命意识形态权威逐渐确立的语境中，他对启蒙立场的坚守和理论建构的“悖时性”都极为突出地彰显出其作为“异端”的品格。首先，胡风坦荡真诚、爱憎分明而又不畏权势的性格，与鲁迅颇为契合，获得了鲁迅的充分信任和器重，也以他的人格魅力和才华获得了许多作家和文艺青年的支持和爱戴，但正如鲁迅所说，他“鲠直，易于招怨”，也使他在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纠葛之时很容易产生冲突。胡风是活跃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在与鲁迅的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精神联系。鲁迅的人格精神、鲁迅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新文学成为他建构自己文艺理论的根基。在与革命文艺正统派的争论与批驳中，他提出了以“精神奴役创伤”“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精神奴役创伤”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有着显著的承继性，都体现了

立足于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启蒙立场,当然侧重点已有不同。如胡风所说:“他们底生活吁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胡风,“置身”189)如果说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视角主要着眼于文化批判,寻求对于国民根性的质的概括和诊断,四十年代胡风则将其注入了更多社会历史根源的分析和社会实践改造的考量。“主观战斗精神”,则是“文艺批评的双刃剑,它一面对准认同平庸日常状态视文艺如万物的悠闲态度和‘性灵主义’文学,另一面则对准缺乏个人真实体验只尾随伟大事业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及其文学”(刘再复,“胡风的性情”12)。当然,它也是对青年鲁迅倡扬的“精神界战士”的时代回响,是在战争语境中对主体精神的高扬,强调以高强度的感性体验(“血肉”)和心理层面的自我激战实现文艺创作中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把握。“‘动员民众’的文化、文艺的任务,不能是简单地使人民成为战争的‘工具’,而是要‘为大众服务’,使人民能够理解自己、社会、以至世界而获得通过战争来解放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生的祖国’的觉悟。”(“论现实主义的路”478—9)某种意义上,它隐含了胡风将战争的时代主题与五四启蒙内核加以嵌合的强烈意图。四十年代以降,革命文学无论是观念还是创作实践都受到来自政治威权的日益严厉的规范。如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起的对《论主观》的批判时已然显示的重要信号,如邵荃麟所说,“胡风先生和其他先生所说的自我斗争,和我们所说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207)这里的“我们”已然宣告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一种组织化的力量”(钱理群 35)与一个固持独立立场的异端分子之间的立场分野和潜在定性。这与由《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路线产生了偏离和冲突。

对于“异端”谱系而言,胡风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胡风本人在主流文化风向不断收缩、意识形态规训日趋强化的语境中在文艺理论立场上的非调和性。“他始终坚持着一个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秩序、改变传统社会的立场,并将这一思想文化的追求视作真正的左翼精神,这一精神与追求民主、科学的五四传统紧密相连,与

鞭挞奴性人格、改造国民性的鲁迅传统一脉相承,构成了胡风自身强大的且不容易为外力所动摇的精神堡垒[……]在另外一些政治标准之下,却相当‘另类’和令人生疑,完全是‘左右难辨’,胡风越是在自己认定的方向上发展,就越是与政治主流的立场渐行渐远,以致自我毁灭。”(李怡 4—8)在意识形态威权日益严峻的压力之下,胡风不是选择退让或策略性调和,而是以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搏战”式姿态应对权威理论家的集体发难。他的理论阐发中对文艺主体性的大力张扬以及文学应当揭示“精神奴役创伤”的理论诉求,显然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国民性”主题和“精神界战士”人格召唤的承续和扬厉——这一切,都使胡风的个性及其理论带上了显著的“对抗”色彩和突出的“异端”特质。另一方面,作为“异端”谱系的构成部分,胡风不只代表他自己,还代表了以他为核心的“七月派”这个庞大而独特的文学派别。胡风以鲁迅启蒙文学传统为根基,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构和人格感召力量,以其主编的刊物为中心形成了国统区的重要文学流派——“七月派”及其亲近者。这个以群体形式出现的与主流革命文学规定性有所偏离的文学派别标示出“异端”谱系的广延性和历史的纵深感。五十年代中期胡风本人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悲剧命运,将“异端”谱系的境遇和文化困境铭刻在历史中,成为言说“异端”谱系绕不开的沉重镜鉴。

“异端”谱系的重要人物还不能忽略胡风的弟子、七月派小说代表作家路翎。胡风与路翎被视为革命文学历程中理论与创作互动相契的一对“师徒”。路翎是在胡风直接影响和扶持下走上文坛的青年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非常贴切地印证了胡风的理论诉求,也给予胡风的理论探索和构建以有力的支持。路翎小说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规范之外开启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向度,将精神和心理复杂性的挖掘和呈现作为叙事的核心结构,与强调社会性与阶级性的主流革命文学叙事规范产生了龃龉。路翎小说的语言形式、叙事策略方面与强调“民族形式”的解放区文学大异其趣,他把重心放在了对人物心理、意识、精神的深度展示上,这使他的“人民书写”大悖于阶级论观念中单纯、质朴并在阶级斗争中获得新生的“工农兵”形象。而这一点受到了胡风的高度肯定和

鼓励,他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是表相上的标志,也不时所谓‘意识’上的富豪,他从生活本身底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现了人生诸相”(“一个女人”99—100)。路翎小说中的“人民”密集着庞杂、动荡的意识和心理内容,这种“人民”形象的书写方式,显然有悖于革命文学的主流,却不难看到它与五四新小说之间的精神牵连,由此所联结的则是对于“人”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的重新改造:对象上,五四新文学中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作为个体的“人”被置换为作为集体的“人民”,他们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遍布于社会底层的矿工、农民、兵丁、小职员、流浪汉、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女性等,在社会构成中占据“数量”的主体地位;书写方式上,保留并强化了五四新文学从“内面”写人的传统,执著于内在的心理和精神领域高密度、高强度的呈现。路翎笔下的“人民”形象缺失了作为“类”的阶级-群体属性,而成为精神化、意识化的“个体”存在,成为“知识分子化”的人民,被指斥为“衣服是工农,灵魂是资产阶级”——这显然接续了五四启蒙文学“人”的书写轨迹。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均悖离了革命权威话语理论的规定,也加剧了胡风文艺理论与正统派的革命文学话语的内在冲突。胡风理论和路翎的小说创作互相映衬,构成了1940年代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极其“另类”的一个部分,最大化地呈现了“异端”谱系的精神特质和历史命运。

以上我们按历时性线索罗列了革命文学发展中具有较显著的“异端”特质的一些艺术家(这个“名单”当然是不完整的),从中显示出“异端”序列的历史连续性。无疑,“异端”分子承受着来自外在身份的历史规定和内在心理、精神际遇的双重焦虑、冲突和危机。革命文学知识分子普遍怀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始终关切着社会民生的苦难,并对革命抱持坚定的信念和虔诚的膜拜。然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资源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五四启蒙思想的洗礼,也不可能从精神深处彻底斩断与所谓“旧传统”的牵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历史性偏误和曲折,使这些更具个性特征和反思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疑虑和偏误。在民族危机不断激化的过程中,来自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与政治意识

形态规范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张力,这种种因素使革命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在精神上保持着普遍性的紧张状态。

总体上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打破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容共存的结构,一方面是民族主义高涨导致的对于“现代性”的质疑、抵制和否定,另一方面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红色苏维埃,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展开了一个关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美妙蓝图。以陈独秀等为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他们从建设现代性的文化思想领域迅速转向通过实际革命行动把“期待”转化为现实的革命热潮中。伴随着这个过程而展开的,则是新的主流文学价值的构造:民族主义激发的现代民族国家诉求跃升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与有着俄苏现成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一拍即合,逐渐发展出一种带有高度政治化和实践性的革命意识形态,恰恰是由于它恰逢其时地呼应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求。“革命文学”的概念提出时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对于“启蒙文学”(即文学的现代性)带有暴戾性的声讨。“以长远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霸权和思想文化的霸权从来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政治霸权需要思想文化霸权的辅助和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思想文化霸权则需要政治霸权帮助它维持其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为它争取更多的地盘,为它打退各种异端的挑战。”(刘再复 林岗 6)革命意识形态所预构的现代民族国家“神话”,最终使许多启蒙知识分子放弃了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重估一切价值的信念,“转变到确信一种主义,认同一种主义,并以此为宗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立场”(7)。

上文选择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对革命文学“异端”谱系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精神承续的大致线索做了简要的描述和概括。通过对“异端”谱系之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隐在特质进行梳理、提炼,寻索其深层的思想脉络和精神谱系,并寻找构成其“异质性”的内在根源、症结和困境之所在,将会从中辨识出革命文学内在分裂与冲突得以集中凸显的某种历史性冲突,呈示出来自启蒙现代性的追求和民族国家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隐含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结构和困境,这

也许能给予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性进程之历史困境和根本症结的审视和思考。

依据惯性对革命文学单一质地的历史认定以及概念化呈现,固然能充分表现宏大叙事的整饰和气概,但却遮蔽了种种被压抑的微言“杂语”;它虽使历史面貌变得简洁分明,却也可能化约了更具实感的脉络与枝节。倘若人类观照历史不只是为了发现并反复验证某种普遍性的质,还希望能从沉静的凝视中洞见到被视觉盲区和惯性所遗失的新的可能性——那么,对于革命文学所谓“异端”谱系的耙梳和析理将会敞开某种新的可能,它将使我们看到革命文学话语方式和价值维度的多重历史交错。由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语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生发展伴随着国/族、启蒙、救亡、革命、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等多重主题的交错勾连。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应用者和价值承续者、守护者,在很大程度上建构并承载了特定民族文化资源和精神根脉。革命文学的“异端”谱系恰恰以最为复杂的形态将上述主题熔铸于一体。“异端”谱系所蕴涵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冲突,无疑是最能凸显中国现代性之独特面貌与精神特性的光标。当然,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异端”谱系的遭际和命运,他们应对困境的方式和姿态,也将现代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极其深刻地凸显出来,留下了现代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耐人咀嚼的历史沉思。

注释[Notes]

- ① 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② 见张学明:“论中古基督教之异端”,《世界历史》5(2003):66-74。
③ 见钱理群:《丰富的痛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Chen, Duxiu.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陈鼓应:“尼采和陈独秀的文化观比较”,《尼采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42—54。
[Chen, Guying. “Comparison of Cultural Views betwe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Chen Duxiu.” *New Treatise on*

Nietzsch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42-54.]

程凯:“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郑州大学学报》1(2006):75—77。

[Cheng, Kai. “Looking for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Left-wing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1(2006): 75-77.]

丁玲:“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49—50。

[Ding, Ling. “Generosity, Tolerance and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Monthly*.” *The Complete Works of Ding Ling*. Vol. 7.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49-50.]

耿传明:“‘苏生’和‘毁灭’之间的预言——鲁迅的精神特质与‘灵明’开启的现代性”,《文学与文化》3(2013):84-94。

[Geng, Chuanming. “Prophecy of Revival and Destruction: Lu Xun's Spirit and Initiations of Modern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3(2013): 84-94.]

何心隐:“寡欲”,《何心隐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0。

[He, Xinyin. “To Limit the Desires.” *Selected Works of He Xinyin*.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40.]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478—573。

[Hu, Feng. “The Road of Realism.”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Feng*. Vol. 3.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478-573.]

——:“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序《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9—102。

[---. “One Woman and One World: Preface to *Hungry Guo Su'e*.”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Feng*. Vol. 3.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99-100.]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85—91。

[---. “Placing Ourselves i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Feng*. Vol. 3.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185-91.]

黄宗羲:“原道”,《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2—3。

[Huang, Zongxi. “The Origin of Dao.”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ang Zongxi*. Vol. 1.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2-3.]

- 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Ji, Kang. *Annotations of Collected Works of Ji Kang*. Ed. Dai Mingy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 李建军:“王实味与鲁迅的文学因缘”,《小说评论》4(2012):49—56。
- [Li, Jianjun. “Wang Shiwei's Literary Relationship with Lu Xun.” *Fiction Reviews* 4(2012): 49-56.]
- 李新宇:“鲁迅的遗产与萧军的命运”,《关东学刊》1(2017):5—19。
- [Li, Xinyu. “Lu Xun's Legacy and Xiao Jun's Fate.” *Academic Journal of Northeast* 1(2017): 5-19.]
- 李怡:“左右难辨的胡风”,《鲁迅研究月刊》12(2012):4—8。
- [Li, Yi. “Hu Feng: Leftist or Rightist.”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12(2012): 4-8.]
-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 [Li, Zehou. *Contemporary Readings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李贽:“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贽文集第二卷·藏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7。
- [Li, Zhi. “Preface to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Biographie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thology of Li Zhi (Collection of Book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00.7.]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Liang, Qichao. *Research Method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Other Two Works)*.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梁振杰注:《大学中庸集注》。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 [Liang, Zhenjie, ed. *Variorum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刘勇:《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
- [Liu, Yong. *Marxism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刘再复:“胡风的性情与悲剧”,《华文文学》6(2016):10—17。
- [Liu, Zaifu. “Hu Feng's Temperament and Tragedy.”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6(2016): 10-17.]
- 刘再复 林岗:“中国现代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华文文学》6(2015):5—22。
- [Liu, Zaifu, and Lin Gang. “The End of Generalize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6(2015): 5-22.]
- 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Lu, Xun. *Collection of Southern Accent and Northern Intonati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6.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 *Grave.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3(2013):116—30。
- [Luo, Zhitian. “Chen Duxiu and the Turn of *New Youth*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3(2013): 116-30.]
- 吕周聚:“论鲁迅的异端思想”,《鲁迅研究月刊》12(2008):42—48。
- [Lü, Zhouju. “On Lu Xun's Heterodox Thought.”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12(2008): 42-48.]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Mao, Zedo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6.]
- 钱理群:“建国前夕对《论主观》的批判和胡风的反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2013):33—45。
- [Qian, Liqun. “Criticism of ‘On the Subjective’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u Feng's Respons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4(2013): 33-45.]
- 乔国强 姜玉琴:“法国启蒙思想与陈独秀的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05):217—28。
- [Qiao, Guoqiang, and Jiang Yuqin.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Chen Duxiu's Literary View.”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2005): 217-28.]
-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3年。
- [Qu, Qiubai. *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Vol. 2.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3.]
-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93—723。
- [——. “Superfluous 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Political Theories*. Vol. 7.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693—723.]
-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07—238。
- [Shao, Quanlin. “On the Issue of the Subjective.” *Selected Reviews of Shao Quanli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207—238.]
- 施仲贞：“《论语》中‘异端’研究史考辨”，《人文杂志》3（2009）：31—37。
- [Shi, Zhongzhen. “Research History of ‘Heterodoxy’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3（2009）：31—37.]
- 王福湘：“‘革命的前驱者’与‘精神界之战士’（二）——陈独秀与鲁迅启蒙思想的比较”，《鲁迅研究月刊》2（2005）：43—54。
- [Wang, Fuxiang. “‘Pioneer of Revolution’ and ‘Warrior of the Realm of Spirit’（2）：Comparison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between Chen Duxiu and Lu Xun.”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2（2005）：43—54.]
- 王实味：《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 [——.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Shiwei*.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House, 1998.]
- 萧军：《萧军全集》第11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 [Xiao, J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Xiao Jun*. Vol. 11.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8.]
- ：《延安日记》上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 [——. *The Diary in Yan'an*. Vol. 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许寿裳：“回忆鲁迅”，《鲁迅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112—15。
- [Xu, Shoushang. “Recalling Lu Xun.” *Biography of Lu Xu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112—15.]
- 尹康庄：“试谈陈独秀文学思想中的两对矛盾观念”，《学术研究》4（2004）：131—35。
- [Yin, Kangzhuang. “On Two Pairs of Contradictory Ideas in Chen Duxiu's Literary Thought.” *Academic Research* 4（2004）：131—35.]
- 张福贵 刘中树：“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中国社会科学》6（1996）：167—78。
- [Zhang, Fugui, and Liu Zhongshu. “The Time Difference and Heterogeneity between Late-Ming and May Fourth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1996）：167—78.]
- 郑家建：“论鲁迅的六种形象”，《东南学术》2（2016）：159—74。
- [Zheng, Jiajian. “On Six Images of Lu Xun.”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2（2016）：159—74.]
- 支克坚：“冯雪峰、胡风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派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2008）：37—54。
- [Zhi, Kejian. “Feng Xuefeng, Hu Feng and the School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4（2008）：37—54.]
-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Zhou, Zuo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赵勇）